

论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 与市场化改革

张卓元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前 言

本书收集了1988年以来我写的论述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化改革的有代表性文章（不包括有关价格改革、物价和通货膨胀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已收集在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的《论中国价格改革与物价问题》一书中）。本书和《论中国价格改革与物价问题》一书是姊妹篇，体现了我近六七年来从事经济研究的主要成果，囊括了这一期间我所写论文的最主要的部分。

本书分七个部分，即实施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发展和改革都要稳中求进；财政金融政策与改革；推进市场取向改革；中国市场发育问题；有计划商品经济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外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经验。

从80年代起，就有一些论著称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经济学家为中国经济学界的稳健派。的确，我一直主张实施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发展和改革都要稳中求进，同时应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以改革促进经济稳定和使经济转入良性循环。尽管这些见解遭到一些经济学家的非议，但我至今不悔，并打算作出进一步的充分的论证。最后还是让实践来检验和作结论吧！

本书各部分文章以发表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一般按原貌编入，只有个别地方作文字修改。有些文章有重复，也未作删节。

科学研究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联系进行探索。限于自己的水平和见闻，在探索过程中定有不切合实际和不周全之处，敬希经济学界同行和广大读者批评赐教！

本书的出版，得到经济管理出版社和孟昭宇、苏全义等同志的热心支持与帮助，谨致衷心的感谢。

张 卓 元

1995年2月18日于北京

目 录

第一部分 实施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	1
优先稳定经济，加快改革步伐.....	1
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推进市场取向改革.....	16
稳定宏观政策，深化经济改革	
——1992年经济发展期望.....	30
继续实施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	38
实施稳健宏观政策，深化市场取向改革.....	42
第二部分 经济发展和改革都要稳中求进.....	49
稳定经济和深化改革的双向协同构想.....	49
超高速背后隐藏着不稳定因素.....	60
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应稳中求进.....	63
稳中求进还是改中求进.....	67
经济发展和改革都要稳中求进.....	73
第三部分 财政金融政策与改革.....	79
财政政策要为经济的稳定和协调发展服务.....	79
深化财税改革，提高经济效益.....	83
利息率论	
——利率的水平、结构、功能和利率的市场化.....	90
建立市场经济势在必行，发展商业保险大有可为.....	119
货币供应增长率应控制在比GNP增长率高一倍以内.....	122
海口税收征管改革的启示.....	127

第四部分 推进市场取向改革.....131

继续推进宏观调控机制和流通体制改革.....131

用深化改革促进治理整顿.....141

坚持治理整顿要和深化改革结合起来.....145

在继续治理整顿中推进改革.....159

抓住时机，推进改革.....162

以改革促进稳定，在稳定中求发展.....166

努力建立竞争性市场体制.....170

深化城市改革的主线问题.....177

总结经验，加快改革.....185

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190

改革任重道远.....207

以改革促稳定，在稳定中加快发展.....211

第五部分 中国市场发育问题.....215

改革市场环境，促进商品经济发展.....215

谈谈建立买方市场的必要性.....229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234

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240

搞活流通，促进农村生产的发展.....244

加快市场发育，深化体制改革.....246

论当今市场.....257

从市场的导向作用看流通也决定生产.....260

论培育和发展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263

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272

中国大陆的市场发育与价格改革.....277

近期我国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的任任务.....284

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287

第六部分 有计划商品经济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305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如何向商品经济模式转换 305

 改革必须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 320

 初级阶段理论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327

 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331

 有计划商品经济与市场取向改革 338

 社会主义实践与社会主义商品理论的发展

 ——《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问题研究》序 351

 收入极大化：经济导向目标及其缺陷

 ——从一个侧面看“一切向钱看”的谬误 359

 应强调改革开放同社会主义方向的一致性 374

 市场经济有利于提高人民消费水平 379

 中国经济改革理论三步曲：商品经济论、市场取向论、

 市场经济论 38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法的重大意义 394

 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几点认识 397

 重温孙冶方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

 ——纪念孙冶方同志逝世十周年 403

 《决定》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贡献 407

 论《决定》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 413

第七部分 外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经验 423

 亚洲三国发展的经验

 ——世界银行曼谷“计划和市场研讨会”述评 423

 中越经济改革对比与启示

 ——越南经济改革考察报告 434

第一部分 实施稳健的宏观 经济政策

优先稳定经济，加快改革步伐*

近两年来，我国认真贯彻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经济形势正在缓慢地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尚未真正走出困境，经济生活中仍然存在严重问题。今后应着力于使经济逐步转入良性循环。为此，需要继续把稳定经济放在优先地位，在保持宏观经济平衡的条件下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继续优先稳定经济

1991年以及整个“八五”计划期间，都应把稳定经济作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为此，必须防止经济发展速度过高，再度出现经济过热和总量失衡；警惕和防止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坚

* 原载《改革》，1991年第2期。

持把市场零售物价水平上涨率压到两位数以下。这不仅有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也有利于经济改革的顺利推进。

我们过去一直没有处理好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往往牺牲经济稳定追求经济增长，结果经济在短期上去后又掉下来，经济发展呈现大的波动，造成严重的损失和浪费，欲速则不达。在实践的一再教训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保持经济稳定，在稳定中求发展，最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在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关系中，应把经济稳定放在优先地位，经济增长要服从经济稳定。世界各国的经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社会经济有一种内在的扩张冲动，如对增长不加以控制和管理，经济很容易走向过热。1987年5月，世界银行在泰国曼谷组织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韩国经济学家曾经介绍说，他们国家经济主管官员的大部分精力，要用于控制经济的过快增长和对常常过热的经济进行调整。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的矛盾是经常出现，需要恰当处理的。治理整顿以来，我们较快地克服了过热病态，恢复了宏观经济的稳定。但是由于经济尚未转入良性循环，伴随着紧缩而来的，是市场销售不畅，产成品积压严重，工业企业经济效益下滑，财政困难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同志过分夸大市场疲软问题的严重性，似乎这是一切经济困难的症结，于是出现了一种呼声，主张大量增加信贷投放以促进市场滞销商品的销售，大幅度增加投资，争取“速度效益”（即用高速增长求效益）。用这种办法启动市场，必然又一次把经济推向过热，新的通货膨胀将接踵而来，从而陷入膨胀——紧缩——膨胀的恶性循环之中。

要稳定经济，首先要控制经济发展速度，主要是工业发展速度。我们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这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过去我们总是追求不切实际的过高的发展速度，造成不良后果。在中国，根据过去的经验数据，看来6%左右的经济增长率是比较适当的，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6%左右的经济中速增长，也是“八五”期间乃至整个90年代的客观条件所允许的。90年代我们要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二步目标，就是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要比1980年翻两番。198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为4470亿元，2000年实现翻两番，应达到17880亿元。按1980年价格计算，1989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为10020亿元，比1980年增长1.24倍，平均每年增长9.38%，已经提前实现了翻一番。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约比1989年增长5%，达到10520亿元，那末，以1991年为起点，平均每年增长5.5%，到本世纪末就可以实现再翻一番，即实现第二步发展战略目标。这个现实条件，可以减轻人们追求过高速度的压力，特别是减轻人们用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来刺激经济高速增长的压力。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一般比同期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率要低一些，过去约低两个百分点，估计90年代要低1.5个百分点左右。这样，要保证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工农业总产值的平均增长率应达到8%。预计我国农业在正常情况下，年平均增长率为3.5—4%，而工农业发展的适当比例为2—2.5 : 1，这就要求工业的年增长率在8%以上。

国民收入增长率一般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持平。在人口增长得到有计划控制的条件下，经济的中速增长仍将使人均国民收入在90年代增长50%左右，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并不是速度问题，而是产业结构失衡，经济效益低下。农业、交通运输和通讯、能源和原材料工业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发展落后，供需之间存在较大的缺口。1986—1988年，我国农业和工业总产值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4.36%和16.65%，两者之间的比例为1 : 3.8，明显低于正常水平；铁路货运量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5%和10%，两者的比例为0.35 : 1，低于0.5 : 1的合理界限；能源弹性系数为0.4，低于“六五”时期0.61的水平。这些情况说明，基础产业落后，已成为实现国民经济顺利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要

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八五”时期经济发展的中心环节。

治理整顿以来，我们在加强农业方面取得进展，1989和1990年农业总产值分别增长3.1%和5%，同期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8.5%和6%左右，恢复了两者的正常比例关系。其他基础产业，如能源、通讯、交通、原材料等生产同加工制造业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也有一定的改善，但是进展不够明显。也就是说，通过资产存量的调整来调整产业结构的目标基本上没有实现，通过调整资产增量来校正产业结构的工作也进展不大。重视和加强农业与其他基础产业，适当抑制加工工业的盲目发展，包括改组改造加工工业，仍然是今后的重要任务。

要解决经济效益低下的问题，除了首先要搞好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资源配置效益外，也要通过完善企业机制、科技进步和加强管理等，逐步提高微观运作效益。国务院决定1991年为“质量、品种、效益年”，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稳定经济的另一根本标志是排除明显的通货膨胀。在改革时期，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两位数以下，最好是控制在5—6%之间，也可以认为经济大体是稳定的。

经过两年的治理整顿，1990年市场零售物价水平已趋于平稳，年上涨率只有3%。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1990年的低物价上涨并不牢固。许多调价措施尚未完全落实到涨价上。由于价格关系仍然严重扭曲，迫切需要继续提高基础产品价格，由此将推动产品成本上升和物价上涨。尤为可虑的是，1989年第四季度起，信贷投放过猛。1989年第四季度新增贷款达1200亿元以上。1990年银行贷款和货币供应量增加过多，其中银行贷款增加2500亿元以上，增长率达20%多，大大超过经济增长加物价上涨的幅度，是1987年以来增长幅度最高的一年；货币供应量（现金发行加存款货币）也将增长20%以上。这必然增加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压力。如果总是寄希望于继续投放资金来刺激需求，必然造成新一轮的物价大幅度上涨。还有，财政赤字居高不下，财

政向银行借支增加，也将推动银行多发票子，使货币供应量超前增长。因此，今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不能进一步放松，都要以防止通货膨胀的重新抬头作为出发点。考虑到1991年计划安排盘子不算太大，经济发展速度不算高，加上1990年农业大丰收，1991年农业即使是普通年景，粮价仍可望稳定。因此，1991年我国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的可能性不很大。但是，1991年以后，抑制通货膨胀的任务会加重。我们在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要倍加小心，切忌追求那种必然以通货膨胀为代价的“速度效益”。因为从高速度中求效益的想法和做法，仍然是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粗放式发展路子，只能招致需求生长过旺和总量膨胀，破坏消费品和投资品市场的平衡状态，使公众产生通货膨胀预期，引发新的通货膨胀，然后被迫重新调整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失和浪费。我们只能以抑制通货膨胀为出发点，安排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安排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速度。也就是说，必须坚持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是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也要很好考虑不要助长通货膨胀，价格改革要分步推进，避免一次放开大部分产品价格引发物价总水平的过大幅度上涨，防止调价幅度太大引起过大的连锁反应和物价的猛烈上涨等。

继续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

着眼于使经济转入良性循环

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许多问题是经济体制特别是双轨运行的体制造成的，过多的行政干预，严重的行政壁垒，妨碍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因此，继续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尽量缩短双轨运行的痛苦阶段，为经济转入良性循环和稳定发展奠定体制基础，就显得格外重要和迫切。只有使经济逐步转入良性循环，才能避免解决了老问题又出现新问题的困扰，跳出膨胀——紧缩——膨胀的怪圈，避免大的折腾和波动，从而

避免通货膨胀的重新袭击。

治理整顿以来，我国理论界对如何深化改革，是否应当继续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出现了不同的认识。例如，有的文章反对继续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甚至批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有一篇文章有一个小标题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摆脱当前经济困境，深化改革，是继续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还是贯彻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文章接着说：“理论界对当前经济困难产生的原因和摆脱困境的对策，有不同看法。有一种意见认为，近几年出现的经济困难和严重通货膨胀的深刻根源，在于搞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因此，出路在于彻底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搞一个以此为中心的配套改革的整体方案，国家对经济主要搞‘间接调控’；企业要成为完全独立的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价格要放开，以推动市场的形成。这样就可以逐步形成宏观有管理的市场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当前如果强调运用行政手段，要求集中多一些，就有悖于改革、开放的方向，为进一步的改革设置障碍。只有这样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加大改革步伐，才能推进治理整顿。舍此别无他途。这种意见值得商榷。”

1979年以来，我们经过改革实践经验的积累，逐步明确，要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主要是抓好互相联系的三个方面：（1）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2）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关键是推进价格改革。（3）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控制 and 调节经济运行。在我看来，

刘日新、许江萍：《对当前治理整顿面临的几个新问题的看法》，《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0年第19期。

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实质上就是市场取向改革的主要涵义。而我在前面列举的文章所认为“值得商榷”的观点，除个别用词有某种区别外，正是我们通常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上述三个方面，即形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体制的框架所必要的改革。

深化改革继续要以市场为取向，原因在于，传统体制之所以存在许多弊端，需要改革，就在于它是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排斥市场机制的，因而窒息了经济的生机和活力。因此，改革传统体制，就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扩大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市场为取向。当然，市场取向改革要同计划指导和宏观控制相结合。

怀疑和反对市场取向改革的同志，把1988年爆发经济危机从而要求对经济进行治理整顿，主要归咎于前几年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或者说是改革搞过了头。如前述文章就认为，过去几年“片面强调微观搞活，导致宏观失控”，“片面强调分权，导致财力物力过度分散”，“片面强调市场调节”，“甚至要实行市场经济”，等等。我认为，这种判断并不准确。1988年的经济危机，是多年积累问题的总爆发。其深刻根源，不是体制改革搞过了头，而是原有体制的缺陷和政策失误造成的。

在体制缺陷方面。各部门、地方和企业都存在投资饥饿症和扩张冲动，导致需求膨胀和不求效益，企业只负盈不负亏，过分追求短期效益，职工收入增长往往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窄和不够健全，市场价格制度尚未确立，长期形成的不同商品或要素之间的比价扭曲远未纠正，导致产业结构畸型和失衡；“铁饭碗”的劳动制度和“大锅饭”的工资制度尚未打破，企业不能破产，职工不能失业，从而不能形成必要的优胜劣汰和经济约束机制；双轨制价格并存和流通活动无序，导致中间流失严重；各地区从本地利益出发，热衷于把资金投向已属长线的加工工业，并实行地方封锁和市场分割，等等。所有这些，都促使总量膨胀，又带来结构失衡。

在政策失误方面，主要是1984年下半年以来，用扩张性的宏

观经济政策支持高速增长的倾向总的来说占据支配地位，几次调整，如1985年底1986年初的紧缩，1987年第四季度的紧缩，都尚未到位就匆忙放松信贷，重新扩张。这样，货币过量供应就成为前几年货币政策的主要方面。经济发展的急于求成，迅速地把经济引向过热，通货膨胀，物价过大幅度上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不但使高速发展难以为继，也恶化了改革的经济环境，几次拟议推进的价格改革都因经济关系的紧张而被迫拖延下来。

1979年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正确，成效显著。即使是1984年以来，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也是这样。在基本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有：过分的放权让利和利益刺激，而对转换机制有所忽视；过多的向地方分权，而对企业——市场分权不够，即主要向行政性分权倾斜而实行经济性分权不够；一度企图绕开难度最大的价格改革；宏观调控机制改革滞后，等等。这样看来，前几年的改革，并不是市场取向改革过了头；毋宁说，是市场取向改革还不够，还要进一步深化。考虑到市场机制作用的局限性和盲目性，在推进市场取向改革时，必须同国家的计划指导和宏观调控相结合，使改革遵循着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方向前进。

在明确了改革要以市场为取向，实现计划与市场的内在有机结合以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就比较容易确定了。根据12年的改革实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似可规定为：建立与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概括说来，就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体制。这种新体制，按照我的理解，一方面，商品经济活动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另一方面，又必须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控制和计划指导，使社会商品经济活动纳入有计划发展的轨道，避免出现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在这种体制下，宏观经济要由中央政府有计划地控制和调节；微观

经济活动主要由市场调节，大量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其生产经营活动都面对着同样的竞争性市场，建立比较合理和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等等。这样也能较好地体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

掌握宏观经济稳定时机，积极推进改革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看清楚，只有深化改革，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体制，才能真正使经济转入良性循环，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而经过两年多的治理整顿，我国宏观经济已恢复平衡，趋于稳定，正好为改革的顺利发展创造了比较宽松的环境，我们应当抓住时机，积极推进改革。

1. 要积极推进价格改革。

改革实践表明，价格改革是实现经济运行机制转换的关键，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条主线，但价格改革是经济改革中难度高风险大的改革，要求的条件苛刻，特别是要求有比较宽松的市场环境。如果宏观经济不稳定，市场态势比较紧张，价格改革就会引发物价的大幅度上涨，招致市场波动，影响社会稳定，甚至会破坏改革的声誉。当前，应当抓住目前仍然存在的价格改革的比较良好的机遇，进一步推进价格改革。这包括：

第一，进一步调整和提高基础产品的价格，提高原油、煤炭、原材料、交通运输、粮食（国家定购部分）等的价格，以便从经济利益上引导人们加快发展这些长期属于短线的基础产品和基础设施，推进产业和产品结构的合理调整，合理配置社会资源。

第二，继续放开那些供求平衡或者供求虽不平衡但供给弹性大而又非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产品的价格，首先应把那些本来已经放开、1989年又管了起来的商品价格陆续放开；“八五”期间由市场调节或半市场调节的价格从目前的50%左右提高到70%左右。

第三，逐步取消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实现并轨，并且

大部分产品并为市场轨，少数产品并为计划轨。这个过程可以同调整过低的基础产品的价格结合起来，同缩小双轨价差结合起来，因此对于并为市场轨的产品价格来说，调整价格只是为放开价格准备条件；目前要防止把双轨价只并为计划轨的单一化倾向。

第四，逐步理顺购销价格关系，变暗补为明补，减少价格补贴。价格补贴只限于少数最重要的人民生活必需品，如居民口粮和某些公用事业收费等；即使是居民口粮，也要逐步减少低价供应数量，缩小购销价差。以上这些，对于合理引导居民消费、调整消费结构是非常重要的。

价格改革不能绕开，而且由于价格改革是最重要的改革，它常常会成为带动其他改革的“突破口”，因而需要抓紧进行。鉴于我国国情，我们在现阶段价格改革只能分步推进，而不能施以“电激疗法”。尽管渐进式的改革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延长改革的痛苦时间，但却可以避开大的风险，实现平稳过渡。

2．要推进企业改革。

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另一条主线。企业改革同价格改革要互相配合，互相促进。所谓配套改革，最重要的，第一层次的配套，就是企业改革同价格改革的配套。企业不改革，不把国有企业从行政部门附属物改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即使转换了价格形成机制，建立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价格体制，企业也不可能对市场价格及其变动作出灵敏的反应，指导其生产经营活动。当然，只进行企业改革，企图绕开价格改革，企业改革也不可能成功，因为定价权是作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企业必备的权利，同时如果仍保留行政定价体制，价格关系严重扭曲，就不可能真正形成竞争性市场，企业之间不可能有平等的竞争，这样，整个经济运行机制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转换。企业改革范围很广，目前主要包括：

第一，继续增强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已经颁布的搞活企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国有企

业的效率归根结底来源于竞争。因此，政府要创造必要的环境和条件，使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以促进国有企业之间、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这就是说，对国有企业，包括大中型国有企业，不要过多地考虑如何用行政力量施以优惠待遇，多方扶植，而应逐步增大市场压力。

第二，继续调整所有制结构，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发展非国有企业。要继续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以充分发挥我国资源的优势，适应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要求，加速农村工业化发展。继续引导和鼓励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积极发展。同时，进一步对外开放，改善投资环境，健全投资、税收等政策，推动“三资”企业在那些有利于增加出口创汇和进口替代、促进技术进步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行业中的进一步发展。应当看到，发展非国有企业，对于促进竞争性市场的形成，增加对国有企业的市场压力，是很有利的。

第三，完善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要从税利承包向资产及其收益承包的方向发展，并使承包和企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技术改造、设备更新等结合起来，以抑制企业的短期行为。应当明确，在中国，承包制不是企业改革的长远方向和目标，它只是当前比较现实的选择。要逐步创造条件，使承包制向政企分开、产权关系比较明晰的股份制过渡。因此要扩大股份制的试点，例如可以在有些城市中较普遍地实行股份制，新建企业应尽可能利用股份制形式等。

第四，继续在一些劳动密集型小企业中推广租赁制。租金不仅要以固定资产、流动资金为依据，而且还要考虑各种级差收益，如坐落地点、专利、商誉等。对于那些长期经营不善而亏损的企业，可以拍卖。

3．推进宏观调控机制的改革。

前几年，在搞活微观经济、扩大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对宏观调控机制改革重视不够，以致偏重于放权让利，忽视机制转换；

直接调控放松了，间接调控的改革滞后，以致于在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了混乱和无序。改革宏观调控机制，建立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已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宏观管理改革的方向，仍然是从直接调控为主向间接调控为主过渡，更多地运用财政金融手段来调控经济的运行。当然，改革仍需分步进行，不能操之过急。这方面的改革主要包括：

第一，金融改革。改革银行体制，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功能，包括提高中央银行的地位，扩大中央银行在实施保持价格基本稳定的货币政策方面的自主权。改革货币发行的管理制度，应主要按经济增长率来确定货币增发量，随着信用关系的扩展，不能再只以现金代表货币，要逐渐以M1（现金 + 存款货币）来代表货币，做到既要控制现金发行，又要控制存款货币，合理确定货币供应总量。把“政策性贷款”与“商业性贷款”分开，防止用银行软约束来代替财政软约束，尽量减少以至消除用银行贷款来支持低效益的属于经营性亏损的企业的运转。与此相适应，要着手分离国家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前者主要办理农副产品收购资金贷款、老少边穷地区贷款、开发贷款等业务；后者则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求资金平衡的方向发展。逐步创造条件推进专业银行企业化，消除商业银行之间开展竞争的行政障碍。

第二，财政改革。实行复式预算，经常预算（即所谓“吃饭财政”）必须确保收大于支，留有结余，绝对不能打财政赤字；经济建设预算除对国有资产收费等外，可以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方式进行融资筹资，但不得自动向银行透支。改革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把现行的地方财政包干体制改变为在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的基础上实行分税制。目前先实行“分税包干”制作为过渡形式，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工商统一税、资源税、盐税等

在1989年的新增存款中，个人存款占70.7%，这要求我们开发多种金融资产，扩大财政债券的发行。